

冯玉祥的一生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James E. Sheridan

196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译出

【美】薛立敦著

丘权政 陈昌光 符致兴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冯玉祥的一生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James E. Sheridan

196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译出

【美】薛立敦著

丘权政 陈昌光 符致兴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路 虹
装帧设计 杨 光

冯玉祥的一生

〔美〕薛立敦著

丘权政 陈昌光 符致兴译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译出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排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莫干山路良化站)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78 1/32 印张11.25 插页2 字数235000 印数00001—358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8-0328-0/G·329 定价: 2.90元

中译本序

王 倬 如

薛立敦先生的《冯玉祥的一生》一书，于1966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外史学界的关注，认为它是近年来所有研究冯玉祥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

丘权政、陈昌光、符致兴三位同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纪念冯玉祥将军遇难四十周年的时候，把它译成中文，与《冯玉祥选集》和《回忆冯玉祥将军》二书配套出版，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我以为读者通过阅读薛立敦的这本书，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方面的益处：其一，可以了解西方史学界研究冯玉祥的状况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其二，由于作者下的功夫甚大，有关的第一手及重要的第二手资料搜集极为齐全，因此读者可从中获得不少迄今为止国内未见的新史料；其三，可以受到启迪。台湾学者唐远华在评介这本书时说，由于作者先提供一个整体的时代背景，再于其中追溯冯玉祥的一生，所以它极富历史感。薛立敦先生这本书的成功处，是在于他把冯玉祥一生曲折复杂的经历及思想演变、性格特点的描述与分析，紧密地与冯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把冯玉祥一生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发展过程来考察，而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这比某些研究冯玉祥的历史著作，只罗列一大堆历史现象，或作一些枯燥

的、静止的、孤立的分析，要深刻得多，也更吸引人。

诚然，在薛立教的著述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把冯玉祥归入军阀的行列就是一例。我以为薛的这种说法是不确的。

早在1936年初，冯玉祥将军就曾对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把他摆在“军阀混战”一章作过反驳。他说：“什么叫‘军阀’？依我说，一是封建主义的，二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三是压迫剥削人民大众的。这就是‘军阀’”。他强调指出：“所谓军阀是指封建军阀，它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或是封建残余势力。……我一贯反对封建制度这是有史可鉴的。为什么把反封建制度的军人称做‘军阀’？有哪个军阀发动过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滦州起义？有哪个军阀摧毁了张勋复辟？有哪个军阀敢把清朝最后一代皇帝驱逐出宫？有哪个军阀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这些行动岂是那些光知道打内战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封建军阀所能做得出来的吗？事实才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怎么能任意歪曲呢！”他说：“军阀代表帝国主义利益，互相打内战，争地盘，瓜分中国。我一向反对打内战，因为打内战遭殃的是老百姓，所以我坚决反对。但是，我要革命，革命也不能不打仗。打什么性质的仗，那就需要分析了，不能说凡是带过兵的打过仗的军人都叫军阀。”

冯玉祥将军说这番话时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我任他的机要秘书。弹指之间，四十余年过去了，今天重温冯将军这番话，倍感入木三分，铿锵有力。因为冯将军以实践证明：他与军阀有质的区别，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邓小平同志指

出：“冯玉祥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冯将军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对中华民族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薛立敦先生称冯为“军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错误的。我们对一位外国学者研究冯玉祥的著作有这样的失误之处，自然不会过于苛求。

在中译本《冯玉祥的一生》出版的时候，我写下了以上的文字，供读者参考，并借此纪念伟大的爱国将军冯玉祥遇难四十周年，寄托我们的哀思。

1987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军阀的出现	1
	晚清的地方主义和军阀主义	1
	军阀时期	9
	军阀与军阀主义	17
二	一个清军士兵	43
	童年	43
	年青的士兵	45
	一个士兵的学历	49
	由士兵变成造反者	55
三	从士兵到军阀	68
	从营到混成旅	68
	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71
	袁世凯恢复帝制	74
	张勋复辟	81
	隶属直系	85
四	常德主政	103
	军事训练与思想灌输	103
	常德德政	120
五	督军	132
	离开常德	132
	督陕	135

陕西当政	138
第一次直奉战争	142
赵倜起事	144
扩充军队	146
督豫	147
被调入京	151
六 北京政变	160
驻防南苑	160
驱逐黎元洪总统	163
第二次直奉战争	169
北京政变	172
冯发动政变的动机	175
结局	185
七 西北边防督办	197
开拓	198
建设项目	200
收入	203
改革	205
国民军	207
苏联的援助	210
政治方向	216
八 失败	230
战争爆发	230
郭松龄倒戈	232
失败	237

国民军在甘肃	242
冯在苏联	246
九 北伐	255
军队问题	255
西安解围	259
国民军政治工作的变化	261
北伐：从广州到长江流域	269
冯与分裂的国民党的关系	275
完成北伐	283
一〇 国民军的结局	295
编遣会议的流产	297
冯的新政	298
甘肃暴动	303
蒋桂战争	307
撤离山东	309
最后的斗争	312
一一 晚年	325
隐居	325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327
抗日战争	329
美国之行	332
去世	335
一二 守德行的军阀	340
译后记	348

一 军阀的出现

在中国历史上，“军阀”通常是指凭借其武装力量称霸一方的人。他能利用不受外力控制的军事组织，在一定的区域内行使有效的统治。1916年至1928年间，整个中国差不多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割据，人们通常称此时期为“军阀时期”。不过，在1928年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军阀和军阀主义在中国政治中仍然是重要的。

晚清的地方主义和军阀主义

当然，军队的地方主义不是在1916年突然出现的，确切地说，这个过程大约比这早一个世纪就开始了，而此时期是它发展的顶点。实际上，即使中央政权处于鼎盛时期，中国也潜在地方主义。通信和交通从未把这个辽阔的国家的各地与其政治中心联系起来。各地的语言、风俗、传统差异很大。中国人虽然一直对其文化感到莫大的自豪，但对爱国主义的褒奖则是很少和不得力的，而对各省和地方的效忠则是有力的^[1]。只要中央政府强有力而真正发挥其职能，地方主义出现的可能性就极小。不管怎样，最高统治当局在这种倾向出现时，是可以遏制的。然而，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使地方主义（或无政府主

义)得以滋长,反过来又削弱了政府遏制其滋长的能力。19世纪和20世纪初,清廷正是遭到这种削弱。

在此期间,西方列强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经济、领土特权。在军事、外交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清政府的威信下降了,财源枯竭,中国的社会结构遭到渗透的西方文化的破坏。同时,国家也为内部的反抗所困扰。到19世纪初,农民的贫困化已达极点。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1850年),全国各地陆续爆发农民起义。清廷的军事机器因长期不用、过于分散,尤其因陈旧而遭到削弱,碰到危机时,它几乎无能为力⁽²⁾。结果,地方武装力量纷纷兴起,以保卫地方利益。中央政府由于不能遏抑这些力量的形成,只能试图控制地方的掌权者,这些人与中央的利益几乎是一致的。在谋求地方武装力量——大部分是豪绅领导的——镇压各地起义方面,中央政府取得了成功。但当太平军煽动的农村中的不满情绪发展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时,地方武装力量就无所作为了,这就需要一种新型的军队⁽³⁾。

在这种需要的刺激下,一些地方武装联合成较大的地方军,1853年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就是第一支这种类型的军队,它为后来的军队树立了榜样。遵照征召、训练湖南民兵以对付太平军的圣旨,曾在现有的地方武装的基础上,组成了一支军队。他通过招募土著,合并地方武装,并向他们灌输整体思想,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到1856年,湘军人数达六万人左右,显然以后又进一步扩大了。曾的军队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成了中央政府唯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⁴⁾。

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交给部下李鸿章一个任务,命他

组织一支辅助湘军的地方部队。这支部队叫淮军，其核心在1862年春形成，到1864年，其人数达七万人。最后它超过湘军，成了一支最强大的地方武装。事实上，差不多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6〕}。淮军和湘军虽然不是仅有的两支地方武装，但它们既是最重要的军事组织，又是地方权力增长的最重要的表现。

这两支军队的地方性表现在其兵员招募上。湘军一直到1856年还几乎全是湖南人，1856年后，湖南人仍占绝对优势。淮军最初主要在安徽招募。军队将领们还谋求其地盘的财权，中央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其对地方军的依赖性，对财政控制也愈益作出让步。曾、李还要掌握其辖区的行政权，这就为军阀的政治机器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6〕}。

湘、淮二军既是地方部队，也是私人的军队，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其首领的私人工具。选拔下属军官的主要标准是对首领的个人的效忠。入选的军官们又以这样的标准来选拔对他们效忠的下级，如此类推，直至普通士兵。所以部队最终只忠于它的头目，而不是中央政府。同时，由于士兵对顶头上司的一片赤诚，其头领具有绝对权威。例如：改编到地方军中的各地方武装的士兵，首先忠于他们各自的小头目，再通过这些小头目忠于地方军首领，这样形成了一个效忠的等级集团。总之，湘军的兵员和给养都来自地方，乡情和义气交织而成的纽带把军队维系在一起^{〔7〕}。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这些地方军的将领们控制着中国仅有的、具有战斗力的部队。此后，清政府便失去了对中国重大军事行动的驾驭^{〔8〕}。地方军首领不仅在他们自己的地盘里执掌

大权，且系国家机构的领袖人物，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淮军首领李鸿章，他在世人面前代表中国长达三十年之久。地方军的首领把持着各省的财政收入^[9]。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均势显著地、永久地改变了。

不错，地方权力确曾被用于支持中央政府^[10]。地方军首领虽然都在谋取地方实权，但并不要求正式独立或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财政及其他种种限制，加之众首领争雄，抑制了他们的权势。再说，清朝的统治者虽系异族，但却维护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反对儒家异端及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地方军首领们也视此为己任。然而，正是这个因素，使他们的权力受到极大的约束。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几十年中，清政府千方百计地试图重新取得对军队的控制权，但均无济于事。的确，地方主义是使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地方自治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想从没有直接卷入战斗的省份调集军队、资金和给养都难以办到。正如李鸿章当时所说：“直隶一省在对付日本一国”^[11]。义和团运动期间，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说明地方独立性的程度。正当清军在直隶与八国联军作战时，该省的高级官员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以及南方的其他官员，却袖手旁观，还与列强签订了一项协议^[12]。1912年清王朝倒台之前，这种令人瞩目的地方主义一直没有减弱。

1894年至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灾难，使中国的军事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它促使军队向现代化迈进，产生了著名的“北洋军”。中国战败后，朝廷认识到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必要性，并要袁世凯制定编练新军的计划。袁是李鸿章的门徒，

1885年至1894年间，他因出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而赢得了声望；战后，他对军事改革发生兴趣，呈了一个按德军模式编练军队的详细计划，得到朝廷的批准，并将五千士兵交给他训练。1895年12月，时年36岁的袁世凯，在位于天津至大沽之间的小镇小站开始练兵，这原是淮军的一个兵站^[13]。

十年功夫，袁世凯练就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队。1901年，他接替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其所部亦称“北洋军”。到1906年，该军兵员约达五万至八万人，但众说不一，它装备精良，训练洋化。但是，袁的成功却在朝廷的一些派别中树了敌。1906年至1907年间，他被剥夺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两年后（即西太后死去使他失去靠山之后），他被革职，隐居河南老家，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为止。

袁尽管遭到这些挫折，但几乎从未失去对北洋军的控制。其因由是，北洋军和早先的地方军一样，是一支私人的军队。袁能够控制它的关键因素，正是先前地方军首领用于控制其军队的精神枷锁——军官们对其的效忠。显然，袁也曾想方设法在士兵中灌输对其个人效忠的思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4]。但他对部将对其效忠这一点更为重视，用人极审慎。比如，他很少任用归国留学生，由于他们所接受的外国训练，由于他们的出身，很难把他们拉拢到自己的周围。袁与其主要部将之间，建立了一种师生关系^[15]。他采用的一种办法是保证其军政要员飞黄腾达，以使师生关系富有实际意义^[16]。他以这种方式奖励过去的忠诚，暗示此后的效忠会带来什么。他还精心保护其助手。如因士兵打了外国人而引起纠纷时，必须把师长撤掉；但事情一平息，袁就让其复职^[17]。他用这种手法成功

地培养起部下对其的忠诚，使他不在位时仍能效忠于他，一旦革命到来他能毫不费力地官复原职。

1912年，袁的北洋军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队，但不是唯一的。军队现代化的尝试未能更新清朝复杂、陈旧、松散的军事机构，朝廷对各省的软弱无力妨碍了旧军队的废除，结果五花八门的杂牌军遍布全国各地。有的较新式，有些现代气息，另一些则极陈腐。实际上，所有的军队都是属于省当局的，而且多少具有私人的性质。

从19世纪中叶的私人军队到北洋军，有其自然发展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军队的性质发生了极大变化。最初的一批私人军队是通过科举制的阶梯爬上政治舞台、在清廷中飞黄腾达的一些文官创立的。他们虽然十分懂得军权的用处，但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活跃在许多领域，并取得了成功，但军界除外。他们的价值，正如他们的职位一样，主要是文的，不能给军事活动增添多少威严。地方军首领愿意采用某些西方的技术和装备，但极有限。训练中采用一些西方的方法，但也不多。他们拒不授予新设立的西式军校毕业生以指挥官职位，就是受传统的、反欧化倾向的限制的一个极好证明^[18]。由于这种歧视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末，所以这些毕业生的新知识，大部分没派用场。总之，从根本上说，早期的地方军是文官领导的、一心维护儒家学说的旧军队。

虽然最初的一批地方军创始人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晋升的文官，但他们在军事上的成功，为无资望的人开辟了一条谋求权力的新路。通过在地方军里服役就有可能荣升要职。1861年至1890年任命的四十四四个总督中，有二十个是曾任地方军首领然

后晋升到显要地位的。同期任命的一百一十七名巡抚，大半在地方军里当过军官。约四分之一的巡抚没有获得科举制中的两个最高科第中的任何一个；这些人大多数是通过军队上台的^{〔19〕}。这种人一度对官袍加身颇为渴求，因为官之尊仍是人们的社会心理。但随着旧世纪的逝去和新时代的到来，他们逐渐认识到武运亨通本身就足够了。

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结局。居首位的是，现代化的需求终于迫使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这更加强了谋求权力的老路行不通的观点。与此同时，有教养的中国人对武职蔑视的老看法也在逐渐改变。作为军队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清政府着意抬高军界的威信。新军的严明军纪与旧军的松散陈腐，也造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有助于军方树立声誉。义和团惨败后，作为清政府改革计划的一部分，规定小学生必须穿军装，所有学校，包括教会学校都设立军训课^{〔20〕}。在军人一直受蔑视的国家里，这种革新是引人瞩目的。

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施加压力，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外国观察家注意到这种情绪的出现，尤其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及其后，中国人为亚洲人战胜一个欧洲大国而欢欣鼓舞的时候^{〔21〕}。1905年以后，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选修军事科目^{〔22〕}。其后军人在西方也受尊敬，随着愿向西方学习的情绪的滋长，西方的态度在改变中国人的看法方面也起了作用。从军也许还不是一个无上荣耀的职业，但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约在本世纪初，由于军人的权力和威望在不断增长，而中央政府的权威却在逐步下降，所以，军队的将领不再利用军事

上的显赫来谋取文职，而专心致志地从事军事活动。其时，许多军人接受训练是为了谋求官职，这与早期的地方军首领是不同的。

袁世凯虽身居文职，但他与其一些高级官员为这种职业倾向树立了榜样。另外，他们不象早期的地方军首领那样，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把清王朝看作是儒教的堡垒，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是军人而不是信奉儒教的官员。不管怎样，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在外来的及其他方面的压力的影响下发生了急速变化，要维护它已是不现实的。此外，更重要的是，袁的前程暗淡。1908年后，清廷厌恶他，对其不放心。袁虽处于权力的顶峰时期，但要想具有以前一般情况下的权威已不大可能。在他以前的地方军首领，没有一个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而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急于要用其掌握的兵权达到个人的目的。

这些社会的、个人的因素造成的结局是，袁及其部下不再受早先的地方军首领宣布独立的准则和忠诚的约束。早先的地方军都是私人的军队，然而北洋军是在不承认任何超越个人的原则和目标这个意义上，成为第一支完全属于私人的军队的。从这方面说，它表明了军阀主义的开端。

总之，清王朝最后一百年经历了两个互相关联的事态的发展过程。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内外乱的打击下，一步步地遭到削弱，随着中央权力的下落，地方的经济权、政治权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军人的影响愈益扩大，这不仅因为需用武力来对付内外乱，而且因为民族主义和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对军人的崇拜日益加深。它们是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即逐步增强的